

论鲁迅现代历史文学写作观 ——以《故事新编·出关》为例

李业诚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鲁迅的现代历史文学创作存在鲜明的倾向性与价值性，其借笔下种种独立人格的象征意义，通过寻找正确的社会引导方式塑造理想人格，鼓励国民实现自我价值。《故事新编·出关》一文在现实语境下解构与建构了全新的孔老哲学，以超越常境的陌生化，“油滑”的美学特色与游戏化叙述模糊了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界限，消解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使理性的判断力重归于读者，展现了独树一帜的现代历史文学写作观。

[关键词]鲁迅；《故事新编》；出关；历史小说；理想人格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9.1213

鲁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作家，其小说作品长于以严肃冷峻的笔法体现批判精神与历史反思。创作于1935年12月，最初发表于1936年1月20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最终被收录进《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一文继承了以往鲁迅作品对不同情景人性变化细腻的剖析与纵深的探索，隐含着在时代背景下对大众去向何方的问与求。在以往的研究中，《出关》或被看作是对以柔退避的老子的批判与否定，评者多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认为老子的形象是“不合时宜”的道家学说的象征，把老子的“出关”理解为逃避现实、逃避人生的懦弱行为；或被看作是回望先秦孔夫子形象，对其理性的剖析与反思，认为青年时代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徒众的鲁迅在“后五四时代”重构孔子形象乃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或是被以纯然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认为除老子避世外，孔子失去其略显功利主义的追求是社会理想的崩塌，意识到理想的虚幻却不得不维持它的意义，更是一种残酷而痛苦的事实。不管小说文本中的孔老以何种形象出现与被理解，他们所持的相悖的思想都是要植根于社会环境的土壤下才可被检验能否生根发芽。本文意在通过分析《出关》小说文本，探究当时社会环境下独立人格的诉求能否实现及原因，并以此讨论鲁迅现代历史文学写作观及这种观念在鲁迅小说中的具体表现。

一 孤独的实践者

如果思想动员是社会变革的助推器，那么社会发展也需甄选相适应的思想。这种思想起初往往是小众的，是人们不自知的，是“包含着感受、感情、愿望与实践意义的”，是试错后的有利转变。鲁迅不是试错者，他是为社会发展遴选思想，并推动它成为洪流的人。在何时运用何种思想去解惑，去呐喊，是鲁迅的拿手好戏。面对现实的困惑，鲁迅在作品中通过塑造种种不同的人格去面对种种不同的人生境况，去解答这种困惑。¹

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塑造以挖掘人性格上的“软肋”，加以不失真实的夸张为特点。以《出关》小说文本为例，孔子本是至圣先师，在大众认知中更多作为向弟子解惑的形象出现，但在鲁迅笔下孔子起初实有困惑，郁郁不得志，困于抱负

无法施展。此种形象塑造更加真实亲切，贴合20世纪30年代社会中的受难者，与国民们有“通连性”。所幸国民们面对诸多“惑”，仍然是有出路的。小说文本中的孔子作为一个处处碰壁，自觉见识短浅的形象，选择了去求诸老子解惑。这不能算是明智的行为，因为事实证明老子也有“惑”。鲁迅在此运用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疑惑多多解惑寥寥，因此向老子发问虽不合适，却很现实。孔子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孤独者”，他的发问承载了鲁迅对现实的抽象性刻画，蕴含鲁迅对去向何方的追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鲁迅在此利用了合理的现实的思考模式来进行小说文本的创作，希望扭转国民在落后受迫的社会现状中无法摆脱的思想，来达到呼吁韧性人格的要求。

以往鲁迅小说文本中多显定点定型的社会造成人的悲剧，在《出关》中，孔子不仅没被封建社会“吃掉”，还成功跳脱了出来，一问有感，再问得解，因而与老子作别，选择去“入世”。不管孔子有没有真正解惑，“惑”是不是老子作解，奔向的远方是怎样的，孔子终是选择了一条相对向好的道路。鲁迅希望看到这样的人，直面现实的困惑，在解惑中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样的人注定是“孤独的实践者”，但至少能促进国民意识的觉醒。鲁迅在这里重新发掘了孔子身上积极的一面，是鲁迅面对现实求诸自身的“解惑”。²

理想是高远的，现实是残酷的。解惑需要“不同问题意识的推动”，需要在众声喧哗中清醒地破除盲信。《出关》乃至《故事新编》中的小说文本作为神话传说的改编，在游戏笔墨、“油滑”写作下仍具备着相当的现实感，作为“生活伦理的窄化”。现实的困惑如要抛给入世者，那便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方式。不幸的是同一时代、同处一屋檐下，这个困惑是要抛给所有人的。毋论身份地位，主观是否愿意去解惑，所有人都要去决然面对或被迫承受。如果说孔子是鲁迅心中理想型的国民，是较为积极的代表，那么“旁观者”们便是真实的国民，作为“旁观者”，他们的承受与解惑要更有难度。

二、麻木的旁观者

鲁迅小说文本中的大多数国民都能用“麻木”一词来形

容，他对国民不幸的刻画方式不是直接将肉体毁灭、生活不堪铺陈在大众面前，而是更多通过展示思想的麻木，塑造顺从的躯壳来显现的。这些旁观者往往“不能正视苦难而造出奇妙的逃路”。本文接下来论述的三类麻木的旁观者，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逃避，他们的问题是鲁迅在现代历史文学写作中描述较为深刻、获得更多关注、解决较为艰难的问题，是更值得国民去思索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老子，老子是最大最极端的旁观者。老子的“无为”因循自然规律立身处世，这种追求植根于特定时代，出现追求不被理解、崇高不被尊重的情况，并非个人的偏见，而是社会的创伤。

在小说文本中，孔老思想隐喻截然相反的人格，老子于超然洒脱之中尚有余力为孔子解惑。他所提倡的“无为”实是无为，他所自持的“无不为”则颇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如果说起初为孔子解惑是自信的话，那么后来自觉孔子已“悟道”、自身处处碰壁以至于走流沙、出关，便完全是出于自尊的无奈举动。作为最大的旁观者，老子也困惑了。在“消极无为”的大家面前，跟从的是“消极无为”，或是持短见、为小得的大众。老子也许自知与孔争、与世道争中自身羸弱的短处，孔子不一定胜，他固然是败了。老子“以自己的方式放逐了主流”，选择了走流沙、出关，主动选择了避。老子的逃避是避“世”，有主动选择的余地，而更多弟子与市井小民们的逃避则是不自知的，是避“事”，在日复一日中无所事事。老子自尊于自持之观念并不是一边倒的错，又自知比起孔子的碰壁，他的处境更为艰难。老子的“惑”是自身和环境共同造成的，与其说他困惑于“无为而无不为”为何被否认批判，不如说他囿于自身观念中无法自拔，没能看清现实已经容不得不得了。他所希冀的“无为的世界”也需要“有为”去创造，否则在环境压迫之下将没有他“无为”的容身处。老子代表了合理不合群的一类人，他们鼓吹自我、崇尚闲适的格调本身并无大碍，但当社会的需要，群体的方向不允许这种观念大行其道时，它就成了毫无价值，大错特错，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个人偏见了。鲁迅以老子自身的复杂性，证明了在中国现代困境中抉择的艰难——处于高位、自认开化的人囿于偏见却不自知，遇挫后不得其解直至丧失了逃避的机会，这是迫不得已的现状。因此主动选择就变成了被引入新的出路，而逃避也要被逼向新的出路，即使老子主观上想要出关，想要入流沙，客观也是要给 他当头一棒的，让他“还要回到这里来”。³

孔老的人格是社会的极端，社会却并非只有孔老。鲁迅将目光投向孔老的下层，找到了普通人。在激烈的碰撞下他们是逐流的，在动荡的社会中他们是安然的。这种安然并非处境的安然，而是心态的安然。鲁迅在小说文本中以较少的篇幅刻画了这些区别于孔老的独立人格，对他们进行了“有情的讽刺”。尽管他们不是主要人物，且于小说文本中着墨较少，实

则他们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着麻木的大多数，是值得争取却难以改变的大多数。

在老子以外还有一类旁观者，即是以庚桑楚为代表的老子的弟子这个群体，他们内心质朴，既没有孔子入世的崇高理想，对顺命、对无为、对道的追求也没有老子式的执念。他们是云淡风轻的看客，对老师的教诲云里雾里，一知半解或是不得其解。他们代表俗世中的知识分子，在动荡社会中尚存对真我的追求。尽管追求的思想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他们仍是积极的“有所求”“有所待”的。他们的有所求能得到教化引导，他们自身也有一定的悟性且在努力去悟；他们的“有所待”区别于困于生计奔波的人格，是自恃于明白“为而不争”却还要去取雁鹅的人。虽然他们无法做到与老子一样对“道”绝对的追求，但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地方，因为他们尚有可塑性。世俗的知识分子一旦有所转变，向着入世的积极的一面去发展的话，也是值得期待的。

“有所求”“有所待”的另一类旁观者是关尹喜们，他们只是被时代任意摆布的人物，怀揣着街头巷井的小心思，沉湎于得到“实在”的东西。他们所求庸俗、偏于物质，视老子的讲学布道为一派胡言，老套庸俗（即使是孔子讲学也免不了被冠以老套庸俗）；赖以维持生计的方式只是日复一日的机械式工作和从工作中贪图蝇头小利。他们是鲁迅所认为的最悲观的旁观者，有着极强的看客心理，不易从陈规麻木中被拉出改变。鲁迅最为熟知的便是这类旁观者的病苦，作为蒙昧短浅的看客，他们的惰性思维和懦弱思想极难改变。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独立人格，在循环与痛苦的生活往复，或是苟延残喘或是湮灭。鲁迅先生并没有给他们安排一个好的结局，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收获一个好的结局。鲁迅塑造这类人格的动机不在于在他们身上看到觉醒的希望，而在于使其破碎毁灭，让更多的人看到意识到此路不通，进一步转向新的出路。

《故事新编·出关》中尚无单纯困于生计，连得过且过都是奢望，难以见到明天的旁观者，综合这一类旁观者来看，也许鲁迅期待他们有蜕变的可能，虽然这种可能实在是微乎其微的。试想民族能看到关尹喜们、《阿Q正传》里的村民们、《药》里的小市民们有着本质上的变化吗，鲁迅先生对他们也更多是深切的怜悯与悲痛，甚至不想加以虚妄的期待了。

三、理想的人格

鲁迅用入世者代表了他对动荡年代国民的殷切期望，塑造的旁观者浓缩了无数中国百姓的命运，对人格地启蒙“蕴含于多样化的美感中”，种种不同人格遇见种种不同的境况，各自奔向不同的前程。解了“惑”的孔子驱车离去，驶向的也许是民族觉醒的远方，也许是君子入世后更大的困惑。不管前路如何，孔子走向的都是积极的明天。如老子一类的众多旁观者们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直至“无地自容”，为麻木不省的国民敲

响了警钟。鲁迅意在通过两相对比让读者自见一种合理有效的方 式。虚无消极的思潮自欺欺人，逃避现实虚实不分的行为看似可行，实则适得其反。入世的、有为的、发挥主观的、积极的个人也在拯救集体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救。综合《出关》及其他鲁迅小说文本，鲁迅“创造出化零为整的整体隐喻效果”，在不同时代的作品中反映了追求不同理想人格的愿望，理想的人格永远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格，他们性格上也许有缺陷，追求上却是“兼济天下”。鲁迅也在创作中审视自己，纠正人格。对自己的审视在于一反新文化运动时的常态，“油滑”的自评自省，对孔子人格的合理重塑；纠正的则是诸多国民的人格，鲁迅希望孔子们有所发挥且涌现出更多孔子。⁴

鲁迅展示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族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发展方向”的，在对 中国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文本创新后，鲁迅发掘了不同人格上最突出的部分，进行合时宜的创造，将其中良善的、丑恶的一面都展示在读者面前。鲁迅心中的历史文学是“涵养神思，激发心声”的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一针见血，直至当下仍然发人深省。人格塑造上的现实性、贴合社会环境的现实性、理想追求上的现实性使得鲁迅的小说一再出版，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鲁迅的现代历史小说同样是“为民”的文学，他将历史与现实，新潮与传统“紧密地统一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个体内”，有着杜甫一样为民咏唱的特质。鲁迅先生在对一些已成型的人格持有期待的同时，没有放弃另一些尚有可塑性的人格。人民能不去在乎“艰难的国运”，鲁迅是一定要去看“雄健的国民”的。在对麻木的旁观者哀痛的同时，鲁迅何尝不希望他们有所改变。同样作为社会中的人，也有着推动社会的人和顺应社会的人的分别。不是说顺应社会的人就是能“把庸常变为伟大”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鲁迅先生即鼓励这样的人出现。因此鲁迅的现代历史小说又体现一定的时代性，有着为时所著的先进特点。这种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也使鲁迅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能够有效地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在时代的浪潮中追寻理想人格，探寻“民”与“国”的明天。

鲁迅先生作为历史的再创造者、现世的呐喊者、国民的鞭策者，在以《故事新编·出关》为代表的小说文本中将现实融入了历史，以历史隐喻了现实的出路。他塑造的种种独立人格观念上的冲突也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入世与出世、探求与安然间的矛盾。同时他为在冲突中挣扎的人格各寻新的出路，入世思想是顺应时势的不二法门，荒诞虚妄的自我麻痹终将被淘汰。鲁迅先生使得“中国文学的整体流脉经过了曲折的近现代转型和急骤的当代变革”。站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风口浪尖上，鲁迅先生代表了同时代优秀作家的合理诉求，他“揭示了作为精神分析主体的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在现实主义下兼有浪漫主义的大胆创造。

本文所涉及作品版本：鲁迅：《出关》，《故事新编》，

中国商业出版社2018年6月版，第97页——第108页。

参考文献

- [1]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2]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 [3]常立霓：《鲁迅与新时期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版。
- [4]张杨：《荒诞人生的理性重建—鲁迅〈出关〉之解读》，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卷第4期，第84页。
- [5]董炳月：《论晚年鲁迅的孔子观—以〈出关〉及其关联文本为中心》，载《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5期，第42页。
- [6]李怡：《存在的哲学：对现实生命的残酷背弃——鲁迅小说〈采薇〉、〈出关〉、〈起死〉解读》，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92页。
- [7]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自序，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8期，第59页。
- [8]徐妍、李莹：《鲁迅与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美感形态的确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第63页。
- [9]徐美恒：《论鲁迅〈故事新编〉篇章排序的逻辑艺术与主题寓意》，载《西部学刊》，2019年第23期，第77页。
- [10]曹禧修：《鲁迅：站在坟墓前的哲学家》，载《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5期，第14页。
- [11]张平：《论1949年后周作人散文中的“鲁迅”形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第19页。
- [12]张洁宇：《“有情的讽刺”：鲁迅杂文的美学特质》，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4页。
- [13]冯光廉：《鲁迅与孔子研究的另一面》，载《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第36页。
- [14]赵枝一秀：《论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谱系”》，载《九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95页。
- [15]吉田富夫、靳丛林、王姗姗：《关于〈故事新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第161页。
- [16]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第54页。
- [17]刘春勇：《“杂”之于鲁迅：论鲁迅的晚期写作——以〈故事新编〉为中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第186页。